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tailed, light-colored map of the Hongcun Ancient Village. It shows a dense network of streets and building footprints in a light brown/tan color. A prominent, dark brown river or canal winds through the left side of the map, curving around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 overall tone is muted and historical.

段进/主编

空间研究4 URBAN SPACE

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古村落空间解析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Village of Hongcu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段 进 揭明浩 著
东 南 大 学 出 版 社



段进/主编

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古村落空间解析

Spatial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Village of Hongcun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批准号 50378013)

段进 著
揭明浩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内容提要

本书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古村落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资料及现场调研为依据,分析研究了宏村古村落空间生长更替的五个历史阶段:定居阶段、发展阶段、鼎盛阶段、衰落阶段、再发展阶段,以及现状空间形态的村落建筑空间、村落街巷空间、村落整体空间。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全书从“自上而下的主导因素”和“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解析宏村古村落的空间形态。“自上而下的主导因素”的研究首先以纵向分析比较的方法,对村落及周边区域的经济、政治、地理、思想文化、技术等因素的发展演变与村落空间的发展阶段进行比较研究,同时从四个层面来研究村落空间形态的主导因素,即村落整体空间层面、村落内部空间层面、村落组团邻里层面、村落住宅单体层面。“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的研究首先分析了村落民居中基本建筑单元平面和界面的构成模式,接着分别研究了从建筑单元到住宅单体、组团邻里空间、村落内部空间、村落整体空间的构成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本书总结了村落空间生长及村落不同层面空间形态的多种主导因素,并概括了建筑单元平面和界面的模式化特点在村落四个空间层面中的体现。

本书可供从事建筑、城市规则、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者、设计者及管理人员和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古村落空间解析/段进,揭明浩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3

(空间研究丛书/段进主编)

ISBN 978-7-5641-1509-8

I. 世… II. ①段…②揭… III. 村落—空间规划—研究—黟县 IV. TU982.29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9221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出版人:江汉

网 址: <http://press.seu.edu.cn>

电子邮件: press@seu.edu.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 字数:231 千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41-1509-8

印数:2500 册 定价:39.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空 间 序

空间研究的内容很广泛,其中人与其生存空间的问题是涉及城乡空间学科和研究的基本问题。在原始社会,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人类与其生存空间的主要关系仅发生在相对隔离的族群与自然环境之间,因此古代先民与生存空间的关系直接体现为聚落社会与具有“自然差异”的空间的相互关系,人类根据需求选择适合生存的自然空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主要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技术的进步使改造自然成为可能,自然界的空间差异不再举足轻重;而劳动分工使社会群体内部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差异性得以强化。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现代人类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是空间的“社会差异”,而不再是空间的“自然差异”;同时,现代人与生存空间的主要关系也不再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代人的生活时时刻刻处于社会的空间之中,这种转变将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各种力量交织在一起,人与生存空间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

现代人与生存空间的这种复杂关系,使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判断,即:空间本身不再重要,空间的形态与模式只是社会与经济的各种活动在地域上的投影。这个判断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却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在理论研究方面,空间的主体性被忽视,研究的方法是通过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的空间落实来解析空间的形式,空间的研究被经济的和社会的研究所取代,客观上阻碍了对空间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入探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假定:空间使用者是“理性的经济人”;空间的联系是经济费用的关系;经济是城市模型的基础;空间的结构与形态就是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化;人类的行为是经济理性和单维的,而不是文化和环境的;物质空间形态,即我们所体验和使用的空间,本身并不重要等等。不可避免,根据这样的假定所建立的空间是高度抽象的,忽视了空间的主体性,也与现实中物质空间的使用要求相去甚远,并且由于缺乏对空间发展自身规律的认识,以及对空间发展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等,城市规划学科的空间主体性与职业领域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失去话语权。在城市建设实践中,空间规划的重要性不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理论上学术界的简单判断,为社会、经济规划先行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导致了空间规划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空间布置三大规划之中的被动局面,空间规划只能于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规划后实施落实。最终,空间规划与设计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空间规律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城乡建设实践中产生许多失误。

因此,人与其生存的空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简单的社会与经济决定论不能令人满意,并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与经济的力量在塑造生存空间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我们决不能忽视空间本身主体性和规律性的作用。只有当我们“空间”地去思考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达到社会、经济和空间三位一体、有机结合时,人类与其生存的空间才能和谐、良性地发展。这就需要进行空间研究,更好地了解空间,掌握规律。

需要进行研究的空间问题很多,在空间发展理论方面,诸如:什么是空间的科学发展

观;空间与社会、经济的相互关系;空间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方式;空间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之相对应的规划设计方法论等等。在空间分析方面:空间的定义与内涵是什么;空间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空间的结构如何解析;人们如何通过空间进行联系;如何在空间中构筑社会;建成的物质空间隐含着什么规律;空间的意义、视觉和行为规范的作用;采取什么模型和方法进行空间分析等等。在空间规划与设计方面:什么是正确的空间规划理念;空间的规律如何应用于规划设计;规划与设计如何更有效地促进城市发展和环境改善;规划与设计的方法与程序如何改进等等。

这些问题的探讨与实践其实一直在进行。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乌托邦主义者和社会改革派为了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就提出通过改造原有的城市空间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和赖特的“广亩城市”是这一时期富有社会改革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的典型。二战后,由于建设的需要,物质空间规划盛行,城市规划的空间艺术性在这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同时,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为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空间研究的数理系统分析与理性决策模型出现,并实际运用于控制和管理城市系统的动态变化。这期间,理性的方法使人们认为空间规律的价值中立。随后,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环境动荡,民权运动高涨,多元化思潮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对物质空间决定论的批判。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等左派思潮盛行,它们对理想模式和理性空间模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空间的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空间研究应该介入政治经济过程。空间规划实践则成为一种试图通过政策干预方式来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政治行动。这促使20世纪70年代末空间规划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一些理论家从空间的研究转向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空间研究的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逐渐脱离了纯物质性领域,进入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并形成了很多分支与流派,如空间经济学、空间政治经济学、空间社会学、空间行为学、空间环境学等等。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政府调控能力削弱,市场力量的重新崛起,促使空间公众参与等自主意识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空间管治、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理论思潮的涌现,使空间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蓬勃发展的局面。空间研究彻底从单纯物质环境、纯视觉美学、“理性的经济人”等的理想主义思潮里走出来。20世纪空间研究的全面发展确定了现代城市空间研究的内涵是在研究了社会需求、经济发展、文化传统、行为规律、视觉心理和政策法律之后的综合规律研究和规划设计应用。空间研究包含了形态维度、视觉维度、社会维度、功能维度、政策维度、经济维度等多向维度。空间的重要性也重新受到重视,尤其在20世纪末,全球社会与人文学界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学者们开始对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另眼相看,把以往投注于时间和历史、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这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的最重要事件之一。

尽管空间研究的浪潮此起彼伏,研究重点不断转换,但空间的问题一直是城市规划学科的核心问题。从标志着现代意义城市规划诞生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开始,城市规划从物质空间设计走向社会问题研究。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在宏观整体上发生过几次重大转折,与城市规划核心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认知相对应的是从物

质规划与设计发展为系统与理性过程再转入政治过程。经历了从艺术、科学到人文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和规范理论、理性模式、实效理论和交往理论的转变,城市规划师从技术专家转变为协调者,从技术活动转向带有价值观和评判的政治活动。但从开始到现在,从宏观到微观城市规划始终没有能够离开过空间问题。不管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发生什么变化,设计者、管理者、参谋、决策精英还是协调者,城市规划师之所以能以职业身份担任这些角色并具有发言权,是因为规划师掌握了空间发展规律、对规划技术方法和对空间美学原理。只有具有了空间规划方面的专门知识,才可以进行城市规划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评估,才能够进行规划决策的风险分析和前瞻研究,才能够真正地或更好地发挥规划师的作用。现代城市规划的外延拓展本质上是为了更完整、更科学地掌握空间的本体和规律,通过经济规律、社会活动、法律法规、经营管理、政治权力、公共政策等各种途径,更有效、更公平、更合理地进行空间资源配置和利用,并规范空间行为。城市规划的本体仍是以空间规划为核心,未来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也应以空间为核心的多学科建设;目前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实践需求更应如此。

在国内,空间研究一直在不同的学科与领域中进行,许多专家学者在不同的理论与实践取得了重要成果。多年来,在东南大学从建筑研究所到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术团队一直坚持在中国城市空间理论与城市规划设计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我们将发展理论与空间研究相结合,首先提出了在我国城乡建设中城市空间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和城市发展七个新观念(城市发展研究,1996-05);提出了城市空间发展研究的框架和基本理论,试图以空间为主体建立多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方法(城市规划,1994-03);出版了《城市空间发展论》、《城镇空间解析》等专著。我们先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回国人员基金以及省部级科研等十多项有关城市空间的科研课题,同时结合重要城市规划与设计任务进行实践探索。在这些研究、实践与探索过程中,我们取得过一些成绩,曾获得过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国家级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银质奖各一项,省部级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多项,在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在许多重要国际、国内规划与设计竞赛中获第一名。同样,我们也面对着很多研究的困惑与挫折,实践与研究的失败与教训。我们希望有一个交流平台,使我们的研究与探索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得到前辈、同行和关注者的认同、批评和帮助;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平台对以往的研究探索进行总结、回顾与反思;我们更希望通过它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空间研究这个领域。

2005年东南大学城市空间研究所的成立为该领域的研究和探索组成了一个新的团队,这个开放性的研究所将围绕空间这个主题形成跨学科的研究,不分年龄、不分资历、不分学派、不分国别,吸纳各种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氛围,开拓学术领域,深化研究成果,共同分享空间研究探索的苦乐。这套系列丛书正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与探索的共享平台,也是我们进行交流、宣传、争鸣和学习的重要窗口。

段 进

2006年5月8日于成贤街

目 录

0 绪论:研究背景及框架	1
0.1 徽州传统聚落的概况	1
0.2 徽州传统聚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2
0.3 本书研究的意义及内容	4
1 宏村物质空间调研报告	6
1.1 宏村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	6
1.2 宏村物质空间的生长更替	8
1.2.1 村落的定居阶段(1131—1276 年)	8
1.2.2 村落的发展阶段(1276—1607 年)	11
1.2.3 村落的鼎盛阶段(1607—1855 年)	12
1.2.4 村落的衰落阶段(1855—1976 年)	13
1.2.5 村落的再发展阶段(1976 年—今)	14
1.3 宏村物质空间的构成形态	14
1.3.1 村落空间构成	14
1.3.2 建筑空间形态	14
1.3.3 街巷空间形态	18
1.3.4 水系空间形态	20
1.3.5 节点空间形态	21
1.3.6 整体空间形态	25
1.4 宏村物质空间研究相关书刊文献说明	27
1.4.1 相关研究	27
1.4.2 历史资料	27
2 空间生长自上而下的主导因素	29
2.1 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29
2.1.1 经济因素	29
2.1.2 地理环境因素	31
2.1.3 政治因素	33
2.1.4 思想文化因素	34

2.1.5 建筑技术的发展	36
2.1.6 小结	37
2.2 村落整体空间层面上的主导因素	38
2.2.1 村落的选址	38
2.2.2 村落整体空间形态的完善	41
2.2.3 小结	43
2.3 村落内部空间层面上的主导因素	44
2.3.1 村落整体空间肌理	44
2.3.2 街巷空间形态	47
2.3.3 活动中心与场所	50
2.3.4 小结	52
2.4 组团邻里空间层面上的主导因素	53
2.4.1 建筑群体	53
2.4.2 节点空间	56
2.4.3 小结	59
2.5 住宅单体空间层面上的主导因素	59
2.5.1 住宅整体	60
2.5.2 主体建筑	64
2.5.3 附属部分	66
2.5.4 宅院装饰	68
2.5.5 小结	70
本章结论	70

3 空间生长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	72
3.1 从基本构成元素到建筑单元	72
3.1.1 基本构成元素——三合院	72
3.1.2 建筑单元的构成模式	73
3.1.3 建筑单元界面的“原型”和“变体”	77
3.2 从建筑单元到住宅单体空间	79
3.2.1 住宅单体平面的构成模式	79
3.2.2 住宅单体界面的构成模式	81
3.2.3 “数”的扩展形式背后的技术原因	82
3.3 从建筑单元到组团邻里空间	82
3.3.1 上水圳	83
3.3.2 茶行弄	89

3.3.3 月沼	95
3.3.4 前街	101
3.3.5 南湖	105
3.3.6 后街	108
3.3.7 东边街	111
3.3.8 湖堞头	114
3.3.9 吴氏祠堂	117
3.3.10 东边田	120
3.3.11 小结	123
3.4 从建筑单元到村落内部空间	123
3.4.1 村落内部空间特点	123
3.4.2 村落内部空间界面特点	124
3.5 从建筑单元到村落整体空间	125
本章结论	127
 结语	 128
 致谢	 130
 主要参考文献	 131
 附录	 133
附录一(世系表)	133
附录二(历史资料)	136
附录三(附图)	141
附录四(图表目录)	144

0 绪论：研究背景及框架

0.1 徽州传统聚落的概况^①

历史上徽州的区划发生多次变迁。“徽州”在历史上是一个存在的行政地域概念，就其空间地域而言，它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包括现今安徽省的歙县、黟县、绩溪、祁门、休宁、黄山市、徽州区以及江西省的婺源县，其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间以少量的盆地。

徽州地区建置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黟县、歙县属会稽郡，相当于后来徽州地区的范围。公元 208 年，三国孙吴征服山越，立新都郡，辖黟、歙、新（歙南地区）、始新（歙东乡地）、黎阳、海阳六县；公元 280 年（西晋太康元年），改新都郡为新安郡；公元 589 年（隋开皇九年），新安江中下游定名睦州；公元 591 年（隋开皇十一年）置歙州；公元 607 年（隋大业三年），改歙州为新安郡，领黟、歙、休宁三县；公元 62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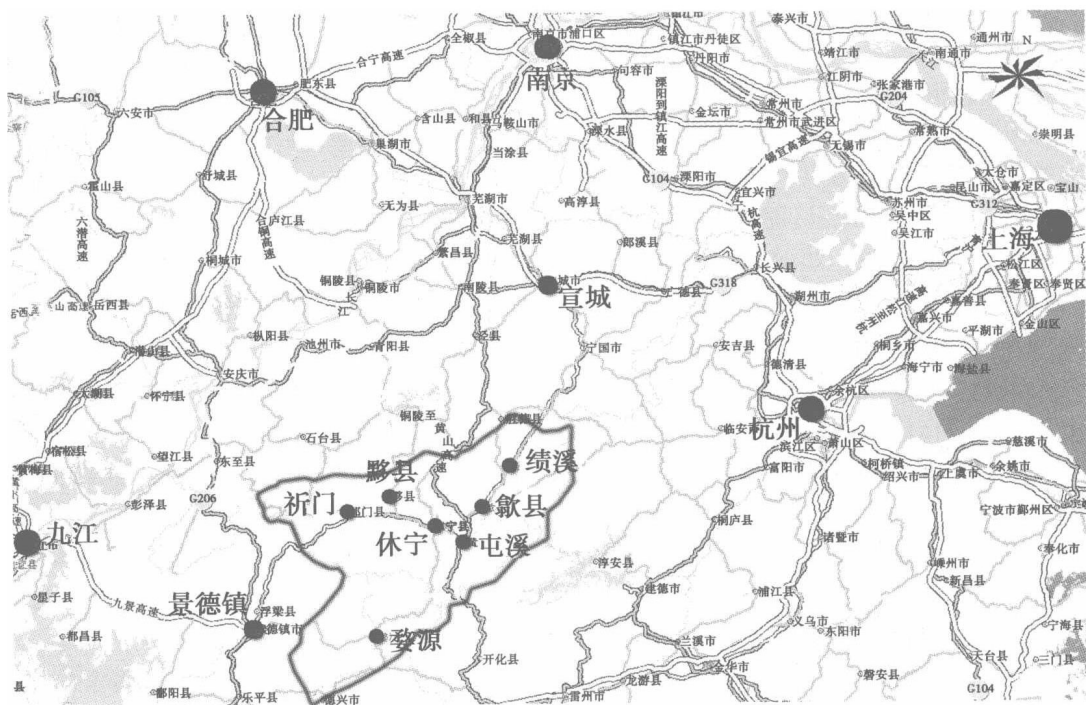


图 0.1 明清时期徽州区位图

① 注：本书为“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村镇空间生长模型”系列研究之一，关于徽州传统聚落的研究可参阅：段进，龚恺，陈晓东，等. 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空间解析.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唐武德四年),改新安郡为歙州;公元 770 年(唐大历五年),歙州领黟、歙、祁门、休宁、婺源、绩溪六县,从此一府六县的格局一直延续到 1934 年(民国二十三年)婺源划归江西省管辖。公元 1121 年(北宋宣和三年),歙州改称为徽州,明、清称徽州府。由此可见,在历史上徽州地区有较大的稳定性,这对保持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有很大的影响(图 0.1)^①。

徽州的人口组成与文化渊源具有自身特色。徽州世称“吴头楚尾”,地处楚文化与江南吴越文化的交界处。在这一南北约 125 km,东西约 200 km 的广袤地域里,秦汉之际就有少数民族百越族居住,“黟、歙以南皆大越之民,始皇刻石徙之”^②。由于汉人的不断迁入,促进了越人的汉化。汉末各地征战、三国纷争、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吞并、南方朝代的频繁更替……使得民间的流徙成为普遍现象。而徽州山重水复,历来少受战乱侵扰,自然成为徙居避难的佳所。

由于汉人的源源迁入,民族不断融合,唐代以后便不见“山越”之称。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多是北方望族,其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及士族门庭观念影响并侵蚀着当地风俗。宋代理学兴起以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观念更为彻底地影响了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朱子的《家礼》成为世人尊崇的道德规范。到了明清,徽州的文化勃兴更是使其得到了“东南邹鲁”的美誉。

0.2 徽州传统聚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独特的自然、历史、人文背景影响下,徽州的古村落以其强烈的个性和规律,吸引着各方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角度研究它的形态、生成及影响因素,其中与建筑、规划学科相关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

(1) 空间实态记录,即用图像及文字准确记录并再现村落中单体建筑、居住群体、整体村落环境的形态。如 1953 年刘敦桢先生调查并记录了歙县西溪南乡遗存的 20 余处明代民居和祠堂;1956 年胡悦谦先生发现并撰文记述了绩溪胡家村古代聚落遗址;随后,张仲一先生等通过对歙县、绩溪、休宁等地的明代民居调查,于 1957 年编著了《徽州明代住宅》一书,从总体布局、平面形制、外观结构和细部装修等方面做了详尽的记载,由于“文革”对古民居的严重破坏,该书成为了解明代徽州民居情况的绝版;1987 年,宋子龙先生出版了《徽州牌坊艺术》(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3 年,俞宏理、李玉祥先生出版了《老房子——皖南徽派民居》(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不仅在摄影艺术上取得成功,强烈的纪实性更使其成为研究徽州民居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从 1992 年至今,东南大学对徽州民居进行大规模的测绘,龚恺、单踊等学者编著了一系列徽州古村落测绘图书:《棠樾》、《瞻淇》、《鱼梁》、《豸峰》、《晓起》等。

(2) 地方社会文化对村落空间的影响,涉及村落整体空间、民居及公共建筑单体等

① 参见:周晓光.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5:36,图四: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境域变迁图

② 汉人袁康著《越绝书》,转引自: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佃仆制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8

各个方面。如1982年王文卿和孙钟阳两位先生在《文化、环境、人是建筑之本——皖南民居建筑》(建筑史论文集)中,讨论了皖南民居的形制、技术和工艺等特色;1986年,当时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张十庆和董卫两位学者分别从风水和宗法制度角度研究了其对徽州传统村落形态的影响;1985年,清华大学何红雨女士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徽州民居形态发展研究》,对黟县西递村的形成、发展、变迁和建筑模式进行了分析;同年,东南大学丁宏伟先生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明清徽州祠堂建筑》;同年,程极悦先生发表了《徽商与水口园林》(《建筑学报》1987-10);1991年,单德启先生在《建筑学报》(1991-01)上发表了《冲突与转化——文化变迁·文化圈与徽州民居试析》;1997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刘磊完成论文《徽州民居与温州民居的比较》,从自然地理条件、民居单体形态、村落形态、村落外部形态等方面比较研究了徽州与温州的民居;1998年,潘国泰、朱永春两位先生发表了《安徽文化史——建筑、园林、雕塑》(《安徽建筑》1998-04)和《明清徽州建筑结构中斗拱的若干地域特征》(《建筑学报》1998-06);同年,王明居先生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徽州园林艺术初论》(1998-02),赵华富先生在《安徽大学学报》发表了《徽州宗族祠堂三论》(1998-04);2003年,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的硕士研究生刘慧璇完成论文《观光凝视下的古村落空间——徽州宏村旅游的空间生产与文化抵抗》;2004年,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晓冬完成论文《徽州传统聚落空间影响因素研究——以明清西递为例》。

(3) 对村落某个或多个空间层面构成模式的研究。如1980年,东南大学杜顺宝先生在他的硕士论文中,详尽地阐述了徽州明代石坊的来源和形制;1991年,殷永达先生在《东南文化》上发表了《论徽州村落水口模式及文化内涵》;同年,东南大学韩冬青先生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皖南村落环境研究》,从景观、村落和宅居三个层次探讨皖南村落的结构模式;同年,江骥先生出版了《徽派建筑》(上海:学林出版社),阐述了黄山地区明清古建筑的形制;1992年,殷永达先生发表了《休宁县下文溪明代双塔结构分析》;1999年,程极悦先生在《徽州古建筑发展概述》(《安徽建筑》1999-01)中阐述了歙县明清时期古民居的形成与演变;2004年,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彭松和陈晓东分别完成论文《从建筑到村落形态——以西递为例的村落形态研究》和《黟县西递村外部空间构成与解析》。近年来,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学者对徽州村落的空间构成模式也有相关研究,如香港大学王浩峰等学者运用“空间句法”的分析方法,对徽州许多聚落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共时性分析和相互比照;2004年,学者Kikuchi在日本建筑协会的期刊《建筑与城市规划》(Journa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2004-01)上发表了以呈坎村为例的徽州传统聚落空间构成与形态研究的论文(“The space composition and form-feature of a traditional dwelling of the Hui-Zhou district in China. The investigation in Cheng-kan village of Hui-Zhou district, Huang Shan city, An Hui Province”)。

(4) 从人口、经济、历史等相关学科角度剖析徽州社会的发展变迁根源,为建筑、规划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如叶显恩先生于1983年出版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张海鹏先生1995年出版的《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姚邦藻先生2000年出版的《徽州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2000年,中国科学院陈伟博士从聚落史、灾害学、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撰写了论

文《徽州传统乡村聚落形成和发展研究》;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姜昧茗硕士从历史文献学角度的论文《论影响明清徽州民居的社会文化因素及表征》,收集整理了大量记载徽州民居的历史资料;2005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周晓光博士从历史人文地理专业的角度完成论文《徽州传统学术文化地理研究》,研究了徽州传统学术文化的历史变迁、空间传播以及徽州传统学术文化景观等问题。

0.3 本书研究的角度及内容

首先,在上述众多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旨在探索以个案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宏村采用个案研究的方式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徽州村落多是聚族而居的宗族式聚居地,这使得每个村落都具有系统化的特征,选择个案进行研究就是为了尊重这种系统性,展现村落空间各要素之间的整体关联性;第二,徽州村落的相似性是不争的事实,本书选取的世界文化遗产古村落宏村在众多徽州村落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使得我们的研究在村落个案的层面上具有确实的科学性,与《空间研究》丛书第1辑《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空间解析》结合,对于徽州村落这个宏观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其次,世界文化遗产古村落宏村遭遇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为了把这份宝贵的遗产更好地传承给后人,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关于宏村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大多掌握在当地村民的手中,而广大学者关于宏村的研究大都是零散地出现在各类文章中。本书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以长期深入现场调研为依据,力图较全面系统地对宏村进行研究,展示一个完整的案例研究。

再者,传统自然形成的古村落研究对当代城市规划与自然生态和谐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借鉴意义。正如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于2002年到宏村参观后对宏村给予很高评价:“错落有致,布局有方,家家流水,古建飘香;参观宏村,领悟规划理念之道。”因此,本书对宏村的深入研究,也希望能在“错落有致、布局有方”之中领会“规划理念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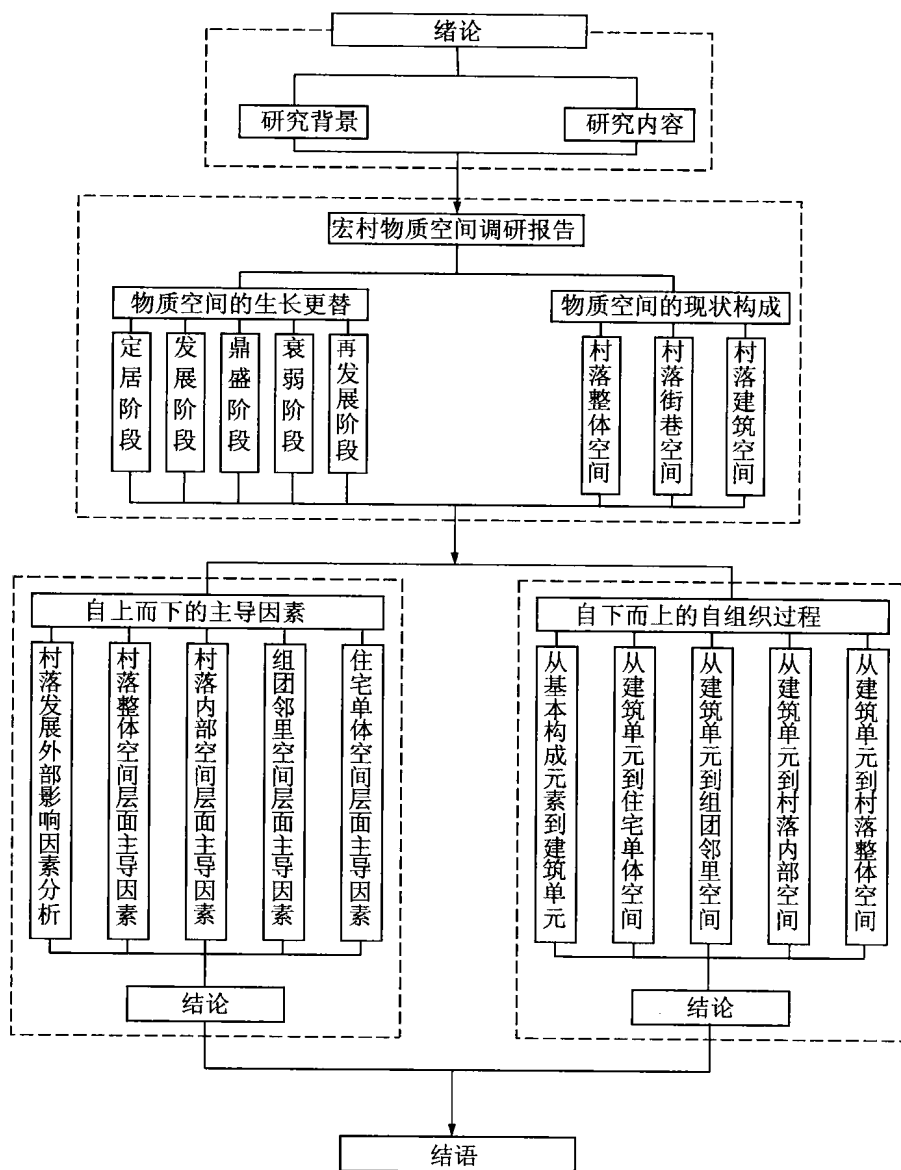
本书的研究内容是通过村历时性和共时性空间形态的研究,来展现宏村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时空演变;在此基础上,参考了中国古代营造活动研究中“道”和“器”的两种视角——即将无形的观念把握与有形的具体制作这两种活动类型区分开来^①,在发展动因方面从“自上而下的主导因素”和“自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两个不同的视角来解析村落的空间形态成因。

中国古代“道”、“器”的长期分离导致在村落的形成过程中影响村落发展的思想文化与村落的具体营建无法直接“对话”,因而关于村落在营建过程中的具体经验、方法便一直处于“失传”的状态。本书以村落空间形态作为“道”、“器”联系的基础,通过村落整体空间、村落内部空间、组团邻里空间、住宅单体空间四个层面的研究,试图为两者提供“对话”的平台,希望能够将村落“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发展经验传承下去。

研究框架如表0.1所示。

①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212,第七章“建筑意匠”

表 0.1 研究框架



1 宏村物质空间调研报告

1.1 宏村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

宏村,现属黟县际联乡管辖,地处黄山西麓,位于东经 $117^{\circ}37'$ 、北纬 $30^{\circ}11'$,距黟县城东北 11 km(图 1.1),古村落面积约 19 hm^2 ;宏村东北距世界名山——黄山 20km 有余,东南距道教名山——齐云山 30km 有余,西北距佛教名山——九华山 120 km 有余。因地处黄山余脉,村落周围山峦环绕,延续了黄山峥嵘的气势:东有黄雉山、石灰岭、甲溪



图 1.1 宏村区位图

岭与泗溪乡相邻,南以扁担山、小岭头与阳光乡相接,西有大野尖、白顶山、大圣亭山、三府尖与碧山乡毗邻,北以扁担铺、学堂山与太平县交界(图1.2)^①。明清时期宏村的主要交通渠道是村西的丹阳驿道,这条南北畅通的古驿道,北通太平县,再转水路可达安庆、芜湖等地;南至黟县县城,转浔阳驿道(今黟县至渔亭方向)可出徽州府或经祈门县往江西(图1.3)。



图 1.2 宏村所处山川水势图

据宏村汪氏家谱记载:宏村汪姓,是春秋战国时山东鲁成公次子颖川侯的子孙;汪氏宗族三十一世祖(江南始祖)于东汉末年首迁浙江绍兴,后至五十五世祖于唐朝末年迁入歙县唐模,至六十一世祖于宋朝初年迁入黟县祈墅村,之后六十六世祖遇大火举家迁往“雷岗之阳”^②,原有房屋共计 13 间,“取扩而成太乙象”故定名“弘村”,后更名宏村。这就是宏村的由来,发展至今已有 870 多年历史。

① 根据黟县际联乡政府《黟县际联乡乡志》初稿 1985 第一篇山河篇“际联乡山河分布图”绘制

② 详见附录一:汪氏宏村一脉世系表(自汪氏始祖定居山东颖川起,各地迁徙,至六十六世祖迁居宏村)

